

→ E
国
别
号



北 国 锄 奸

陈 恭 澍 著

档 案 出 版 社

DJ86/29
出 版 说 明

《北国锄奸》，原书是陈恭澍所著《英雄无名》丛书的第一部，第二部《河内血案——行刺汪精卫始末》，已由本社出版。

《北国锄奸》主要是叙述1932年—1938年，抗日战争前后平、津一带国民党特务对当时的汉奸石友三、殷汝耕、张敬尧、王克敏等人的行刺活动。原书作者是国民党军统局二处派驻华北区的主要负责人之一，曾经担任过军统北平站和天津站的站长，亲自策划、组织、指挥了这些行刺活动。本书叙述的是作者切身经历的事情，情节复杂，惊险曲折。读者可以通过此书了解军统活动的内幕，同时也可以了解当时华北抗战的复杂斗争局面。本书对研究国民党史、中国现代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。

在这次出版过程中，为了帮助读者比较客观、全面地了解和认识某些事情，我们对原书的某些不适之处做了一点删改。

编 者

1988年1月

目 录

第一节	任重道远 勇往直前.....	1
一	学友小聚初识戴雨农.....	2
二	吸收入“军会”与征召受“特训”.....	12
三	成为负有秘密任务的领班人.....	22
四	懵然不知的遇上了国际大间谍.....	30
五	情报活动中的政治运用.....	41
第二节	一鸣惊人 不同凡响.....	50
一	一道突如其来的紧急制裁令.....	51
二	竭尽所能展开侦察部署.....	62
三	果然应验了天网恢恢那句老话.....	73
四	自许是一件完美无缺的佳构.....	83
第三节	(略)	
第四节	急功躁进 铸成大错.....	95
一	争取到对方的亲信作为内应.....	96
二	枪击与毒杀两者之间的取舍.....	102
三	过甚操切所造成的惨痛后果.....	112
四	处置失当步调失常与进退失据.....	125
五	不敢面对现实作了一次边塞流亡.....	133
六	象石友三这种人自然不会有好下场.....	147
第五节	双管齐下 功败垂成.....	158
一	潜入通州一睹冀东伪政权真貌.....	159
二	身陷虎口脱险归来的奇女子.....	169

三	秣马厉兵志士们勇者无惧.....	181
四	可惜我们没有女性行动员.....	189
五	活捉到手的殷汝耕又被他跑掉了.....	201
第六节	枪林弹雨 怵目惊心.....	211
一	全凭一股不畏难险的冲劲	212
二	摸索中接触到一条路线.....	222
三	情势所迫决意拚个你死我活.....	236
四	掩蔽在天罗地网的缝隙中.....	251
五	王文翰智勇兼全一门忠烈.....	264

第一节 任重道远 勇往直前

基于时代的需要，受“九一八”事变及“一二八”事件两大冲击，于一九三二年三月间，以黄埔军校同学为骨干的“三民主义力行社”，遂应运而生。

“力行社”所属的重要部门之一，就是由戴笠（雨农）先生负责主持的“特务处”。

“特务处”开办了一个培植工作干部的训练班，是为我国最早期略具雏型的特务训练机构。

一九三二年九月，国府军事委员会设立“调查统计局”，任命戴笠为“第二处”处长。

论其性质，“力行社”之下的“特务处”，应是政治性的秘密组织；“军统局”所属的“第二处”，则是正式的政府机关。表面上虽是各有隶属关系的两个单位，但在实际上却系领导特务工作的一体两面。

笔者本人是“力行社”领导之下二级组织“革命军人同志会”会员，同时也是“特务处”和“第二处”派驻北平的负责人。

北平的工作单位，称为“北平站”，于一九三二年底开始，是由我们几个初出茅庐的毛头小伙子披荆斩棘建立起来的。

本节，除简单的记述“军统局”创立的概略外，尚有许多秘闻，虽然欲言又止，却也弥足珍贵。

一 学友小聚初识戴雨农

这是五十年前的事了。

一九三一年春天，校长蒋公在南京香林寺官邸，分批召见我们一百多名从各地归来的军校同学，作个别谈话。

自入伍军校毕业分发以来，除了集体训话或列队点名之外，校长在他办公室内，单独和我面对面的说话，这是第一次。当时，是由第一期同学曾扩情引见的。

校长着中山装，安详的坐在办公桌后面的椅子上，桌上摆着一份用十行纸缮写的名册，他手上拿着一枝粗大的红蓝两色铅笔。待我齐步走到办公桌前立定，鞠躬行礼抬头注目时，印象最深的是，校长双目炯炯有光，威仪凛凛，令人不敢逼视。

校长首先询及省籍县份、父母存歿、弟兄几人等家庭状况，边问边听，一面核对名册；随后又问到工作兴趣，我大胆也是由衷的回答说：“部队中的军事工作已经生疏了，其他性质的工作都愿意学习。”我以为这句话会惹他生气，但见校长在名册上做了一个记号，并没有什么不愉之色。

这次召见，前后大约有三分钟，也只问过三几句话，因过程简单，当时並沒有特殊感觉。过后猜想，校长或许是在看看仪表、听听谈吐，在观察中作一次遴选，至于标准如何，那只有他老人家自己知道了。

过了三、四天，接获通知，在一百多人中，圈定了十四个人，开班受训。我在名单中是排名最后的一个。

这个小型的训练单位，定名为“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”，由军校政治部主任鄧悌兼主任，沈遵晦任秘书。当时中央军

校教育长张治中，似乎并不过问这件事。

这个训练班冠以“特别”二字，而实质上也的确与一般的训练机构不同，第一它没有班址，因陋就简的在军校政治部一间办公室中，摆了几张单抽屉的长条桌，两个人合坐一条木板凳，就这么凑合了。第二不规定制服，着中山装、西装都可以，只要不着长衫短褂就行了。因为不穿制服，所以也不作军事管理。此外，没有固定的作息时间表，也不必按时上下班，迟到或早退，并不会受到干涉，可以说学校当局给予高度的自治。正因为如此，所以我们也颇知自爱。至于课程方面，除特约讲授之外，平时并没有教官来上课。

我们所研读的课程，是校长亲自指定的几部书，如《陆象山全集》、《王阳明全集》、《曾文正公全集》、《戚继光治兵语录》、《三民主义的理论之体系》等，自行阅读后，必须将研读心得写成札记，汇齐后，每周一次，呈送校长核阅，阅后发还，多有眉批。

对于这些博大精深的儒学书籍，我们十四个人中，真能读得“通”的，连三分之一都没有，我就是其中的一个。

在受训期间，倒是有一件事作了硬性规定，那就是除星期例假外，中午一定要到军校的“工字食堂”集体会餐。

“工字食堂”在当时是新式建筑，可容纳数百人，布置整齐，收拾干净，一排排的餐桌，横看是一条线，竖看也是一条线，位置井然有序。桌子上铺着白布，所用的餐具也一律是白色瓷器，如要苛求的话，也许只是缺了一瓶色彩缤纷的鲜花。因为它的建筑格式有如“工”字，所以称为“工字食堂”。

校长在中午十二点零五分左右莅临，先由校值星官喊口令，全体起立、坐下，一声“开动”，然后一齐用餐。虽然每个人都小心翼翼的不要发出声音，可是仍然免不了偶有餐具

碰触的声响。

进食时间，约十分钟，大家陆续放下碗筷，摆摆整齐。原位坐正，挺起胸膛，恭聆校长精神讲话。

在校长面前，有一张列有姓名的座位表，每当校长讲话完毕，偶尔也会点名指定某人回答问题。能够侃侃而言，对答如流的则并不多见。大家都担着一份心，惟恐点到自己当场出丑，可也有跃跃欲试的人。

开班后的第二个月，由先期老大哥们发起，我们十四个人具名写了一份报告，呈请校长准予恢复党籍及学籍。因为那时候我们十四人都以个别不同的原因，被注销了党籍及学籍。校长以毛笔批示：“准予恢复党籍及学籍”，签署“中正”。日期大约在一九三一年六月间。原件先是由第一期同学韩浚（仲锦）保管。不久，中央军校特别党部发下“军余”字党证一张；另外，负责“军校毕业生调查课”的田载龙老大哥通知我们，将分别在各期同学录上分别予以“注记”。

这一件校长的批示，我们十四个人都保存了一张照相的副本。我持有的那一张，几十年来，天南地北，东奔西跑，不知道究竟弄到哪里去了。自己仔细想想，可能因为保密的关系，自动毁掉的成分居多。

我们十四个人，以我的年纪最小，期别也最低。其中共有七位第一期的老大哥，他们是韩浚、陈烈、黄雍、俞墉、吴迺宪、徐会之和刘季文；第二期的两位是张炎元、曹勛；第三期的没有；第四期的只有一位郑嗣康；第五期的共有四人，是韩继文、夏大康、谢厥成和笔者本人。

十四个人每月所领的生活津贴并不一样，是按期别高低发给的：第一期八十元，第二期七十元，递减至第五期只有四十元。其实，那个时候的四十元，单是光棍一个人不携家

带小的话，应该是很够用了。

他们有家眷的，全住在外面的，我们几个单身汉，则住在军校职员宿舍里，两个人分配到一间房，我和谢厥成住在一起。谢同学能歌善诵，文艺气质特别浓厚，指定的书他不读，一天到晚趴在桌子上写新诗，高兴起来，还要高声朗诵几句，当时被视为怪人一个。

受到第四个月，有两位同学突然不见了，起初还以为请了事假，过几天就会回来的，殊不料一直过了两个月，我们都结业离校了，却再也没有见到他们。——这两位同学都是广东人，一位是吴迺宪一期老大哥，一位是受训期间和我同坐一张桌子的五期同学韩继文，又名尚英。

当时，并没有特别留意这件事，同学们也未加谈论。若干年后，才知道他们去上海完成了一件机密大事。既称“机密”，虽已年代久远，事过境迁，但仍以“保守”为宜。不过，可说的是：这件事关系重大，在政党活动史中，亦占有一页，只可惜知道最多的几个人都已去世了。

再说我们这十二个人的际遇：

六个月训练期满，正值“九一八”事变之后，校长蒋公手谕，分发我们十二个人向中央党部报到。报到后，等待了许久，却不见下文，也没有一个人被分派工作。究竟为了何故，迄今不明。在无可如何的情况下，我们只好就此分手，各奔前程了。

我并没有什么社会关系，正在进退无据的时候，多蒙黄雍（剑秋）、张炎元（炳华）两位老大哥关爱，叫我搬去同住。他们都没有带家眷，在花牌楼忠义巷一家楼上，分租到一间房子，原来就有家具。当时，两位老大哥睡一张挂着蚊帐的大铁床，我一个人，晚上搭地铺，早晨再把铺盖收拾起来。

我们三个人很少在一起吃顿饭，有时候，也去买点鱼肉回来，打气炉上一烧，三人据案大嚼，倒也香甜。日后我们见面提到这段日子，依然觉得津津有味。

有一天下午，有客到访。来客首先和剑秋、炳华握手寒暄，接着又面带笑容的向我伸出友谊的手。剑秋兄连忙为我们双方介绍说：“这位小老弟是五期同学陈恭澍，这位老大哥是六期同学戴笠、戴雨农。”五期的称“小老弟”，六期的称“老大哥”，这句介绍词有点奇怪。

看上去，他的年龄是比我大得多，浓眉大眼，隆准高颧，身材虽不高，显得很厚重、很结实，称得上相貌脱俗，气宇非凡了。这第一印象，相当深刻，至于他对我的观感如何？那就不得而知了。

同学们聚在一起，也就不拘形迹的谈论开来。四个人所操的虽然都是普通官话，但黄剑秋兄是湖南平江人，张炳华兄是广东梅县人，来客戴雨农是浙江江山人，乡音都嫌太重，话却十分投机，如果不是光线暗下来，还不觉得已经是日落西山。

剑秋兄提议，一同到外面去吃点东西，出了忠义巷不远，有一家本地小馆子，字号是盈丰酒楼，格局不大，只有一楼一底。点了几样菜，叫了一壶酒，吃下来不到两块钱，大家都认为还不错。

自此之后，戴雨农时常到我们这里坐坐，偶尔也同去看一场电影。有一天我们正和房东太太打麻将，戴雨农又来了，他看是我输，大有拔刀相助一显身手的气势，叫我站起来，替我打了几副，但看他吃张摸牌的手法，并不象是善于此道的熟手。

我曾经问过剑秋兄和炳华兄，这位戴同学是做什么工作

的？他们告诉我，只知道他在校长官邸，并不明瞭所司何职。我又不解的追问，他既然在官邸任职，为什么这次校长下野回奉化，他不跟了去？这两位老大哥并没有正面回答我，只含含糊糊的嗯了一声就算了。

我们相处得更熟，彼此间的认识也增进了不少，有一次戴雨农突如其来的问我：“恭澍兄，你认识曹霄青这个人？”我回答说：“岂止认识而已，我们俩同连入伍，同排又同班，而且是双架床铺的一上一下。他是日本明治大学毕业，我只不过才念到中学，可是我们两个人居然交成了好朋友，入伍的时候，他连绑腿都打不好，我还取笑过他呢。”

我顿了一下又补充说：“自从他四期升学进入本校政治科，我因病落后编入第五期步科后，分手到现在，始终没有再见到过。”

戴雨农郑重其事的说：“如果曹霄青目前就在南京呢？”

我说：“那我就马上去看他。”

接着我又反问一句：“他真的是到了南京？”

戴雨农摇了摇头说：“我只是希望他能到南京来而已。”

戴雨农之有此一问，我的确有点莫名其妙，到后来，他才告诉我，曹霄青当时正在上海帮着胡汉民搞“新国民党”，从事反政府的分裂活动。

再往后，我才悟出来，戴雨农突然对我提到曹霄青，多少带点试探或考验性质。

没过多久，校长回京重任艰巨，戴雨农和我们见面的次数减少了，每次来，停留的时间也缩短了。

剑秋兄和我景况如恒，张炳华却显得忙碌异常，有时候甚至于整夜都不回来，回来休息的时间也不充分，一转他又走了。我猜，炳华兄很可能参与了一项重要而又秘密的工

作。

此刻，正值日寇侵入上海，我军奋勇抗战的“一二八”。

近一向，每逢戴雨农和我们相遇的时候，他都会提到：

“有报告呈给校长，可以交给我转上去，比较方便。”我每次都回答说：“没有什么请求，也没有什么条陈，不敢麻烦校长。”我这样说，自己觉得非常得体。其实，我太木头了，他所指的“报告”，并不如我想象的那么狭义，可惜我当时体会不到。

“一二八”事件末了，国民政府迁往洛阳，校长蒋公驻节徐州，戴雨农留在南京。

这一天，戴雨农来找我，他手里拿着一个沉甸甸的大信封，背面还打着火漆。说是“托付”我克日专程送到徐州，要当面交给侍从参谋戴颂仪。

我听说校长正驻节徐州，他既然要我到徐州去，又嘱咐我面交戴参谋，其重要可想而知。我未加考虑就答应了。两张乘车证，以及少许路费，行前，他又告诉我：“有一列专车停在徐州火车证，车站附近有武装警卫，也有便衣警卫，我想你一定看得出来，无论问谁，都可以找到这位戴参谋，信件送到，请他签收就可以了。”

我当天夜里就到了徐州，没走出月台就找到戴颂仪参谋，我把那个火漆信封当面交给他，他翻来覆去看了看，拿了一张名片写上几个字算是签收了，口头上也没有交代什么，就叫我回来了。

看名片，我才知道他的阶级是中校，云南人，后来一打听，原来也是军校同学。

回到南京后，我第一次到鸡鹅巷五十三号戴公馆。这是一所不大整齐的平房，进门后，弯弯曲曲的转了好几转才是

客厅。考究的人家，地上铺的是地毯，他这里铺的是草席。因为地上反潮，没办法，只好穷对付。

我把那张等于签收的名片交给戴雨农，算是完成了他的“托付”。我看他忙，正待辞出时，他突然问我：“有没有相知的福建省籍同学？”我思索了一下，想到四期同学也是好朋友的连谋又名连良顺。我回说有这么一个人，无论是才具、仪表，都可以列入第一流，但不知找福建人做什么？戴雨农不作正面答复，只希望火速介绍一见。

我介绍他们见了面。

戴雨农派连谋到福州建立工作站去了，这事当时我并不知情，良顺兄行前也没有向我告别。

从以上两件事判断，戴雨农任务何在？当可思过半矣。

三月间，我从忠义巷搬到了明瓦廊，只身住在小旅馆里。炳华兄已经派去广东，又一说是到了香港，和他同行的还有吴劲夫（迺宪）。当我们惜别时，虽然没有说明去做什么，可是彼此间已经是心照了。

剑秋兄也把嫂夫人接来了，另外租了房子。他对我表示过，不准备参加戴雨农所领导的工作，宁愿居于协助地位。此后果然如此。

明瓦廊离着三道高井很近，军校同学会就在三道高井这条街上。以此为轴心，附近一带的小旅馆里，住了不少军校同学，有的在等工作，有的在办登记，一时搅合得非常热闹。我之所以搬到明瓦廊，既非找工作，也不是办登记，完全是戴雨农的意思，他希望我能够多留意同学们的动态，尤其是超乎常轨的非份活动。看的单纯些，这是他委托我办的一点小事情，换个角度说，也等于是交赋我任务。我也不太了解——这就是所谓的“情报工作”。不过，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件

事，是他未曾给付任何待遇。也就是说，我尚在客串阶段。

据一般记载，在一九三一年二月底，戴雨农已被圈定为“特务处”处长。这个“特务处”，并非政府机构，乃隶属于新成立的秘密革命组织“三民主义力行社”^①之下。经过筹备，至四月一日始正式成立于南京，所以尔后的“军统”订“四一”为成立纪念日。

戴雨农于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七日空难殉职，特将“四一纪念”改在“三一七”合并举行，简称为“三一七纪念大会”。之后，“三一七大会”年年举行，迁台后仍继续不断，先总统在日，每年均莅临讲话。这的确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。

回想起来，在我们初识的那段时间里，戴雨农原已负有“联络”任务了。

那个时候，是否有一个称为“联络组”的单位？不得而知。唯在“戴雨农先生年谱”中看到的记载是：“一九三一年十二月，蒋公为促成团结，共赴国难，辞去国民政府主席等职务，离京返乡。行前令先生（戴笠）主持联络组，主要任务为团结以黄埔学生为中心之革命力量，侦察敌情，镇压反动。于是，在京、沪、杭、平、津、汉、港、穗、赣等地建立组织，积极活动。”

于此可见，戴雨农此刻负有“联络”任务，自是无疑；不过，所谓的“联络组”，可能不是正式编组，而是一个暂用的名称，用以代表此项活动而已。

至于说，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，就在“京、沪、杭、平、津、汉、港、穗、赣等地建立组织，积极活动”一节，也不

① 简称“力行社”，是国民党特务系统之一，一九三二年四月一日成立。军统局的前身。该组织以侦查、绑架、审讯、暗杀等为其专门职业，消灭异己，破坏革命。

尽然，别的地区不敢说，我就是北平工作的建立者，可是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才派往北平的。

这是一个证明，编写历史性的文字，实在是大不易呵。

戴雨农之任“特务处”，也有许多传说，因为他在“力行社”高级干部中的期别、地位，都比不上别人，此一重任，怎么会交付给他呢？根据戴雨农自己所说：

“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六日下午八时，在南京中山陵园，我接受领袖成立特务处的命令，领袖支持我，固然绝对负责，但次日上午有一位同志，现已出国，名字我不便说了，要来打倒我。他说‘关于特务处的人事经费，校长叫他负责。’次日，我就报告领袖，请求辞职，结果没有准，及至一年以后，领袖告诉我，仍有人来攻击我……”

从这一段话，可知他之出任“特务处”，完全是校长蒋公的支持与赏识。这是因为他早就有过一段成绩卓著的工作经历了。

除了在《戴雨农先生全集》、《戴雨农先生年谱》、《戴笠传》以及其他著述中，所提到的一些事迹，不再重复外，我听一位不许我提他姓名、比我年长十多岁的老者，对我说过许多有关戴雨农先生的行谊，因为这是耳闻，姑且一记，算是戴先生的逸史轶事好了。或者对戴先生前期的工作经历有所参证。

早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〇年之间，戴雨农、田载龙、王天木、胡抱一诸位先生，就曾在河南开封组织一个“三民主义大侠团”，一方面联络、吸收爱国志士，一方面也能作为情报触角。

又如在上海，有一伙帮会中人，意在借故寻衅，向当局提出条件，大讲“斤头”，否则就要如何如何，也是戴雨农他

们出面化解的。

戴雨农先生从来都不炫耀他自己，象以上所举的这一类的事，想必还多。从来都没有听他提起过。我知道或者说我了解，戴雨农的斗争性特强，他要战胜一切横逆，但并不执拗，在坚守原则的前提下，他有一套适应任何环境的超人本领。至于他的知人善用，已经是识者皆知，尤其为常人所不及者，多少名噪一时的铁金刚，到了他手下，也会成为绕指柔。

二 吸收入“军会”与征召受“特训”

我正在明瓦廊小旅馆里，闷着头一个人写稿子，来了一位素不相识自称姓潘的人找我谈话，这是一件多么突兀的事。他也不征求我的同意，就扯开话题，从家庭状况询问到思想教育，再就国家处境谈论到国际情势，他所说的反而比我回答的多，我反复寻思，实在摸不清楚他的用意何在。

当这位不速之客临走的时候，留话给我，说是过几天还有人和我再谈一次。

此人走后，我越想越不是味道，既然不明白他的来头，为什么竟会毫不勉强的回答他的问题？是否已慑于那股不可抗拒的来势？还是早已意会到他是奉命而来的自己人？

过了两天，果然又有人找我谈话，这次却是同期的易同学，我们会过面，只是很少来往罢了。他不再兜圈子，直截了当的说：“现在，一个充满新生命的政治组织诞生了，可以说是大时代中的产物，竭诚拥护我们的校长为领袖，以军校同学为基干，力行三民主义，重振革命精神，复兴中华文化，牺牲个人利益，用钢铁的意志，有严明的纪律，服从组织决